



赵 林◎主编

中西文化的
精神差异与现代转型



上海市
著名商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西文化的 精神差异与现代转型

赵 林◎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与现代转型/赵林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675-2151-3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比较文化—研究—中国、
西方国家 IV. ①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5648 号

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与现代转型

主 编 赵 林
项目编辑 许 静 姚之均
特约编辑 朱笛颖
审读编辑 陆海明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cs.tmall.com/>

印 刷 者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700×1000 16 开
印 张 15.5
字 数 219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2151-3 / K·403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澳门科技大学课题项目

“国学热背景下的中国文化重建问题研究”

编者前言

在当今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迅猛腾飞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各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要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就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以及近代以来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的西方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以把握中西文化各自的精神特质和演进历程。这样才能够在适应全球化时代大潮的同时,弘扬光大自身的文化传统。

为了系统地探讨中西文化的分殊与共性,我们选择在中西文化荟萃之地澳门召开一次题为“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与现代转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于2012年12月1—2日在澳门科技大学召开,参加会议的十多位学者分别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美国、芬兰等国家和地区,均为国际著名的中西文化研究专家。本次会议的宗旨在于,从思想史角度来探讨中西文化的精神特质和演进历程,以便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理论根据。会议代表们将依据儒家经典和基督教理论,针对中西人性论、生死观、善恶观、天人(或神人)关系、称义与成圣、终极关怀、启蒙历程等重要问题发表学术论文,从不同角度阐明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并对中西文化的现代转型历程进行深入探讨。

2011年3月至8月期间,本次会议的三位参加者武汉大学教授郭齐勇、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温伟耀和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赵林已经在武汉大学举行了三场关于中西文化精神差异和现代转型的对谈。对谈录音稿经修订后,已于2012年4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传统氤氲与现代转型——中西文化三人谈》。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次澳门会议可以看作是对2011年武汉大学对谈会议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会议的主题发言人也由三人扩大为八人。

与会代表们精心撰写了会议论文和发言提纲,大家围绕一些共同关心的文化问题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研讨。我们期望,在 2011 年武汉对话会议和本次澳门会议的基础上,与会学者和其他志同道合者能够继续就相关主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学术研讨,逐渐形成一个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从而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产生不断扩大的后续影响。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由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主办,并得到澳门基金会赞助。本次学术研讨会由八场主题报告(及回应和自由讨论)组成,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和发言录音稿经各位与会代表认真修整之后,集结为这部会议文集正式出版。与会的八位学者将对各自的主题发言、回应和自由讨论的相关文字负责,全书则由本人最后统稿。

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赵林

2013 年 5 月 14 日

目 录



天人相与的两个形态与融通的可能	/1
从中西方启蒙历程看传统与更新的关系	/27
中西文化的终极关怀	/71
称义、成圣、成神、成佛与成仙	/97
略论儒家仁爱价值以及推爱方式的普遍性	/119
《尚书·尧典》包含的儒家学说——时与孝	/161
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与现代转型	/185
论为善去恶——儒学与基督教人性论的重构	/217



天人相与的两个形态与融通的可能

报告人：

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人文研究所教授 林安梧

回应人：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座教授 温伟耀



主持人(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教授张志庆):各位专家,“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和现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第一场报告会,现在就开始了。很荣幸主持这场报告会。按照会议的规定,第一场报告会和后面的报告会一样,先有一个主题发言,半个小时;然后是回应和再回应,半个小时;最后是自由讨论时间,半个小时。一共是一个半小时。首先我们有请这场报告会的主题发言人,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人文研究所教授林安梧,他报告的题目是“天人相与的两个形态与融通的可能”。有请林教授。

林安梧:现场主持人,还有在座的诸位同道,前辈,诸位女士、先生,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学术会议。到澳门来应该是第四次。我发言题目定的是《天人相与的两个形态与融通的可能》,是对儒教和基督宗教做一个对比。至于具体内容,就不按照顺序一一报告了,因为我的论文已经打印出来,待会儿还有温教授来做评论,大家就可以进一步进行了。

其实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个思考,就是说,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到底有什么不同,基本上跟前辈先生一样,他们也在做思考。最早的时候,谈论中西异同的先生们总是这么说,西方是重视武力的,我们是重视修养的;西方是霸道,我们是王道。但是慢慢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会说,我们再谈中西文明怎么谈呢?比如谈谈“神人”、“物我”、“人已”这三个向度。这个关系上,西方是“神人、物我、人已”,分为二,中间有一个中介者把它联结在一起。我们基本上是“天人、物我、人已”,本来是不二的,但是也不可能完全不二,还是要有分别的。

因为天人的适度的区分是必要的,神人的区分也是必要的。只是我们是一个“断而不断”的立场。相对来说,在西方来讲,有一个比较清楚的“隔绝”,中间有一

个“第三者”以为联结。我们不是，我们基本上是“天人合一”，或者“天人合德”，“物我合一”，“人已合一”。人已合一可能是通过人去说，物我是通过一气之感通，天人合一也可以讲一气之感通，但是落在人来讲，天人合德。《易传》里面就讲“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样一个“合一观”它与“神人、物我、人已”分而为二的区分有很大不同。神人分而为二，就必须有一个“道成肉身”(incarnation)的耶稣基督来做连接，而我们华夏文化传统，基本上，“天人合德”就没有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做连接，而我们反而是强调人作为有限者，而且有迈向无限的可能。早从《左传》起就强调要“立德、立言、立功”，要“三不朽”。这样一个由有限而可以无限，我讲“天人合德”。

在我们的传统，“物我”也是本来是同体合而为一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像从古希腊以来，清楚的说，物和我分开的，是一个“以主摄客”的方式去成就知识。其实，如其现象来说，原先的思考不是这样的，物跟我是连接在一块儿的，他是一气之感通连接在一块儿，所以我们对一个事物的理解和把握，是从一个“不二”或“合一”再“分而为二”，再“以主摄客”。就我们认识的活动，并不是起先已经有一个客体摆在那里，作为主体的对象，而这个主体去把握客体，我们的思考本身就不是这样的。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原先是合一的，合一的，因为是不二，合一，所以才经由一个主体的对象化活动，分而为二，才“以主摄客”。再者，在我们的汉语里面，知识论就保留了一个最古老的知识论话语，一个认识的字眼，在福建闽南话里面，现在传到台湾，就是 12345678 的 8，“八”就是“分别”的意思，所以台湾人讲你知道吗？就是“尔八否？”(闽南话)，这“八”就是“分别”。那不是“以主摄客”，华人文化传统，我们的知识论上也不是“以主摄客”去问知识如何确立的问题。

再说，人已也是合一的，他是从家庭人伦说的。所以人这个生命，不是作为一个自我的存在来说的，生命是连着你的父母、子孙，你的父母又连着他的父母，所以他最后是父母的父母，通到最后是通到天地。你的子孙继续延续下去。所以这里有一个“生生之德”。所以仁义就从孝悌来讲仁义，“仁者，事亲是也”、“义者，敬长是也”。孝是对生命根源的一个崇敬，而悌是顺着生命根源来的一个横面的展开。如果再加一句慈爱的慈，就是顺着生命根源继续纵面的延伸。在华人文化传

统就出这三个字。孝、悌、慈。这三个字。而这其实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连续观。就这个来看，像阳明讲“一体之仁”，这也是从人伦的关怀，孝悌，慈来讲仁讲义，乃至扩充讲仁义礼智信。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关联到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关系到金木水火土，五行种种，总而言之他就是把宇宙万有一切，人我万物统统关联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即其存在，即其价值，即其实践，统统在里面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万有跟道的合同为一的，姑且叫“万有在道论”的传统，他不是——一个“超越一神论”的传统，去强调一超越而绝对的人格神如何缔造天地。我们是讲宇宙造化、万有、人、我通过唯一那个道如何生发世界。“万有在道论”的传统和“绝对一神论”的传统不同。我们道论的传统落实下来，所以“教出多门”，但“道通为一”。

在我们的传统里面，基本上就不容易发生宗教意识形态的冲突，基本上，我们认为教本来就是教出多门，而道通为一。一切的话语系统，属于教的系统，就只是话语系统，话语系统就是“权”，权变的权，所以可以“开权显实”。所有一切的话语统统是可以忘掉的，因为我们知道，跨过话语有一存在的真实，这是以“气之感通”为主导的。所以讲宇宙造化根源的时候，不是一个话语的活动，是一个气的感通和活动。所以《论语》里面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地宇宙默运造化，气韵生动，而默运造化，他不是——一个话语的论定，这跟基督教《旧约·创世记》开头就不同了，“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于是把它分成了白昼和黑夜”。它通过“说”这个“主体的对象化活动”，而去反映这个世界是什么？这跟整个西方宗教传统是不同的，他是游牧民族，跟后来的商业，其他的关联在一块儿，这是有一些关系的。也就是说，他必须经由一个话语法则的强控制系统，才能构成一个总体。而我们是一个农业的社会，我们聚村而居，基本上我们就是在泥土中一步一步生长起来，自然而然“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你看，像节气的观念到今天为止还是根深蒂固的，还是有用的，就是人跟天地万物有一个感通的关系。所以春生秋杀，过去判刑，死刑犯一定要秋天处决，春天是生意盎然的时候不能处死。这里面能够看到华人的文化传统里面有很可贵的地方。

如上说来，这样诞生的宗教，是通天地，通鬼神，通阴阳，通此岸，通彼岸。相

对于西方的一神论宗教，常常会认为，我们的宗教只有此岸，没有彼岸。这是不对的，我们是此岸通彼岸的。好像我们是只注重生，不注重死，不对。他是通生死幽明的。

“未知生，焉知死”，并不是不论死，而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是“视死犹生”，是通生死幽明。所以他并不是没有形而上的世界，他是形而上跟形而下通而为一的这样的一个人伦的世界，这也是通到天道的世界。我们原先从最原始的巫术信仰，姑且称为萨满教式的信仰，这个信仰的神明由祭祀祖先慢慢取代，但并没有彻底取代，因为基本上他们都是共生共长，共存共荣的，继续生长。所以儒家讲的道德理性也好，道家讲的道也好，骨子里还是不离 Shamanism 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在道德理性强调很重的地方，一样还是有相信巫术的层面的，我们并不把它当做迷信，而是一种信仰的方式。

“百姓以为神，而君子以为文”。这是《荀子》里面就已经说过了。这是通过人文化成的发展过程，这个人文化成是“观乎天文以察事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人文是通而为一的，这不是西方近代启蒙以来这个意义下的 humanism 的。要是从西方近代启蒙意义上来理解整个儒学和整个中国哲学，是不准确的。因为中国的人文是通天文的，所以天文人文地文，彻底要说我们的三才的传统，而不是人文人本的传统，而是通“天地人”三才的传统。这个讲明，慢慢就可以了解我们宗教的独特性。是一个存有连续观下的宗教，而不是存有的断裂观下的宗教，他是一个“天人、物我、人已通而为一”的宗教，他不是一个“神人、物我、人已分而为二”的宗教。所以它对话语的系统，很早就有一个很深的反思。你看老子、庄子就可以发觉到，反思非常深刻。因为他知道一切人理解的世界，是经由“名以定形”、“文以成物”，人通过话语文字说成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是人之所说的世界，并不是世界本身。所以你必须通过所见所听之所说，而跨过所说，而回到存在本身，跟存在相遇。所以我们很清楚“言外有知，知外有思，思外有在”，存在大过于思考，思考大过于认知，认知大过于话语。这跟西方巴曼尼德(Parmanides)以来的传统，强调“存在与思维的一致性”，后来经过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以来主流的传统，把认知，思考，存在，话语连接在一块儿，所以才会构成了 Martin Heidegger 所说“存有的遗忘”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可以跨过的问题，

我们保留了存在的原初性。我们强调要回到存在本身。

当西方在处理整个西方现代性所造成的种种问题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解开了一些。当然骨子里还是很难的。因为他还是面对的以“话语”为中心的思考,而这个话语、思考、认知与存在,基本上是“以言代知,以知代思,以思代在”这个传统。相对来说,我们是“言外有知,知外有思,思外有在”的传统。所以这两个传统一对比下来,很大不同。我们的思考是倾向于跟天地人我万物协和一致的,而不是以人为核心论定这个世界,也不是一个超越绝对的人格神,来说出这个世界,并且建构这个世界,也一样的观察这个世界。我们不是,我们是人跟天地、人我,通过这个通而为一关怀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如果我们这样看起来,可能我们再去好好想想,儒教是不是宗教?儒教在香港法律里面被认定是孔教,是个宗教。在大陆目前还不是个宗教,因为大陆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有基督教、天主教,宪法上立法的五大宗教。到目前为止,儒教是不是宗教?我觉得儒教是宗教。只是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一神论的宗教,也不同于道教的传统,佛教的传统。但是他可能接近道跟佛,并连接在一块儿,构成一个儒道佛三教的传统,只是近现代以来,受西方欧美中心主义的学术标准,或者思想标准,而回过头来说儒教不是宗教。其实你要说儒教里面教团是什么?士,君子都是教士,由此笼成的区域范围成了教团,只不过是发散性的教团。教义是四书五经,崇拜对象是敬天法祖,拜圣贤。这都是崇拜的对象。那有没有教主呢?我想他不同于穆罕默德、耶稣基督、释迦牟尼佛,但是我想孔老夫子就是教主,再往前说,周公就是。这么说,这个精神传统也是一个宗教,只是我们愿意怎么看待宗教这个概念了。这是两个不同的宗教,这两个不同的宗教。

到了现代化之后,我想可以看到,通过比较宗教学,通过宗教学史的总体理解,大概会发现,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的宗教本身之为宗教,而且从人类文明总体来看,这种存有的连续观,这种天人、物我、人己,通而为一的对世界对万有一切的理解方式,恐怕还是占多数。西方近现代以来,连着从古希腊以来所谓“哲学的突破”这样的发展,这可能还不是占多数。而在现代化之后,我们对整个现代化所产生的严重的浩劫,种种严重的问题,让我们重新有反思的机会,重新想这个问题。在“存有的连续观”下,我们很可能有一些新的对比,存有的断裂观,对比于整个西

方现代化产生的种种问题,而去思索人类的未来。所以连带着中国的哲学,文化宗教的发展,以及所谓连着现代化的发展,可能现在再怎么问都不应该再问,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开出现代化。而其实是从现代化的学习过程里面反思,中国这些古圣贤的智慧在现代化的过程里面能起什么作用。而在现代化的过程,在现代化之后,它还能起什么作用。这是我常说的,已经不再是从内圣开出外王的问题,而是在新外王的学习过程里,如何调节内圣的问题。这是我们整个问题是到新的时代,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就好像我们现在不会接受 1492 年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我们可能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会觉得是哥伦布带来一群人,因为航海技术不太精良,也可能是天候非常不好,被吹到了一个旧大陆,而他误认为那个地方是印度。而后来发现那个地方不是印度,虽然他已经把那个地方人叫 INDIAN,现在也不悔改,还是叫印第安人;把那个地方叫做西印度群岛。所以这段历史的记载要变化。变成不是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是哥伦布带着一群人误闯了旧大陆。而他们就把那个地方作为白种人在那个地方生长的新大陆。

我想这些东西可能重新调整以后,包括我们种种其他,比如说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中国当然有哲学,只是中国的哲学重心可能跟西方哲学的重心关心的不一样。而西方哲学的重心之为何,也随着现代化之后大家都在重新反省。难道一定要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主流传统开始吗?还是更大的主流传统里面,还有更宽广的,必须去诠释的东西?宗教一样,我想从一神论的观点来看,佛教也不算宗教,道教要变成多神论的宗教,不是很高级的宗教。但是如果到现在来看,可能我这强调的“教出多门,道通为一”的宗教可能有更多的包容性(暂且不要说优越性)。在这种状况下,在文化多元的互动融通之下,文化的对话,宗教的对话变成是 21 世纪大家所要强调的。可能从这几个角度来看,这个存有连续观意义下的宗教,是比那个一神论的宗教存有断裂观意义下的宗教会好很多。当然也有一个可能,就是一神论的,超越了人跟神分立的宗教,这样一个一神论的宗教,到 21 世纪会有新的发展,新的调节。比如说,一种存在主义的神学的继续发展,乃至一种无神论式的神学,这种强调实践意义的发展。这都是可能的。从这几个角度我都在想,从天人相与的两种不同的形态,我们会发现一种新的融通可能。

台湾地区在二三十年前,有基督教背景的学者以及牧师,他们一起与新儒学学者有一个对谈。后来集结成一本书,叫《汇通与转化》。我常常说那本书既不汇通,也不转化。但是他代表一个起点,几年前我见过林治平教授,因为那个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的,林治平先生是此出版社很重要的主导性人物,我就说我们有机会重新再反思这个问题,他也说是。后来他从中原大学退休了,我今天早上碰到了我的学长林弘信教授,我们也谈到这个问题。其实想说,我们其实有这个新的可能,就是儒教跟基督宗教的一些新的对话。在台湾地区应该有这样的进一步的发展。我想在台湾地区还没有这个发展,澳门已经开始展开新的讨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在今年的夏天,八月间,我见到黄保罗教授,我们也讨论了相关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人类进入到 21 世纪充满了可能性,我们再也不会用叉子认定筷子,而认定筷子是很糟糕的叉子。因为我们要用筷子吃饭,我们可能要重新去认识筷子的价值和叉子本身的限制;而通过哲学的诠释,我常说,叉子一个“主体通过中介者,强力侵入客体,控制客体”的活动方式。而筷子不是。筷子是一个“主体通过中介者连接客体,构成整体,达到均衡和谐才能举起客体”的一种实践活动。所以我常常说,筷子的文明是比叉子的文明还文明的,而这种文明是通天地人的文明。当然,其不文明是另外的不文明,人间事本来就有两面,文明就有两面。比如我们今天谈宗教,有这样的机缘来谈自己的思考。

我刚才讲了大概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理解和心得,就先说到这个地方,另外这篇文章里面所谈到的大体来讲,顺着我刚才那些思考大体这样的。比如说前言谈了一下,跟宗法国家的,跟中国传统宗教的关系,第二节谈到了连续论定下的绝对一神论,主要谈绝对一神论跟征战,权利、语言、命令、执着性、对象化、理性、约制、绝对、专制、共相这些观念连接在一块儿。而相对来讲,万有在道论是与和平、仁爱、情气、感通、无执着性、互为主体化、道理、调节、和谐、根源、整体等观念连接在一块儿。所以我在第三节谈到气的感通,就是万有在道论。第四节就谈到绝地天之通的两个类型,因为绝地天之通是人类文明发展出来的,我们在《尚书》〈吕刑〉,《国语》〈楚语〉中谈到的“绝地天之通”的神话故事,跟《旧约全书》〈创世记〉里说的“巴别塔”的故事相比较的话。我们要说虽然是绝地天之通的,但是绝而不绝,这跟巴别塔的故事刚好是一个对比。而最后我结语就是谈到它的差异跟融通,也想

到上帝创造性自身,跟中国文化传统的生身之德怎么融通的可能。大概这样的思考,是我这些年来在关心的,先报告到这里,先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林安梧教授,下面请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的客座教授温伟耀先生,对林教授的发言做出回应。有请温教授。

温伟耀:大家好。我个人非常荣幸有机会在第一场响应林教授那么精彩的文章。我拜读了好几次,当然林老师的书我也拜读了很多,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启发。从去年大家拿在手头的书,有一个对话开始,我已经提出,我觉得从狭义来说,儒学与基督教,广义来说,中西文化的对话,真的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汇通与转化》虽然没有汇通也没有转化,但是起码也打出了这个问题来,但是到现在我们真的可以坐下来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尤其今天听到林教授的发言,我觉得我们的未来是非常乐观的,因为大家已经进入到对方的理解。基督教跟儒学或者儒教是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宗教就一定不是要你等于我、我等于你,那没有意思。最后你变了我,我变了你!那是笑话。不同就是不同,但是互相之间有更多的不单是理解,而是共融。再进一步推动整个全球的人类将来的文明。这也同时是转为我们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发展,就好像我们这个主题,肯定是需要讨论,也需要大家进一步来合作探讨。我就不再讲一些大范畴的东西,我做了一些简单的响应,提出了我的看法。

对我来说,我现在所提出的,是在我心里面挣扎了很长的时间,也请教林教授和诸位专家。我的意见不见得相同,但是大家可以讨论和对话。我的时间有限,只集中在几个我觉得是比较核心的问题来谈。当然,我本人也不能说是纯粹站在基督教的立场,因为我也是念中国哲学的,我也讲授中国哲学里面的一些课题。所以我希望我站在两者之间,不过我今天站在这里,既然赵林教授安排我来响应,我看他的意思希望我多一点从基督教的角度响应。可能一会儿我坐下来转一下,我又站在儒教的角度批评我们基督教的学者们,这个大家也不要惊讶。我们还是好朋友,但是谈话的时候,大家谈得很真诚。我想的几个问题,提出来不一定有答案,但是开一个题,大家可以继续讨论,这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